

杨立元 著



三
駕
馬
車
論

聖
恭
序



中國文聯出版社

三駕馬車論

翟泰丰



一九九八年仲夏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翟泰丰题签书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驾马车”论/杨立元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3

ISBN 7 - 5059 - 3268 - 3

I·三… II. 杨… III. 评论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9769 号

书 名	“三驾马车”论
作 者	杨立元 著
出 版 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 版 地 址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地 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军 谷之文
封面题签	翟泰丰
封面设计	傅志欣
印 刷 厂	北京振兴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00 千字
印 张	4
版 次	199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059 - 3268 - 3/I·2476
定 价	13.00 元



自左至右：关仁山、何申、杨立元、谈歌

《“三驾马车”论》书序

郑伯农

杨立元同志供职于唐山师专中文系，教书育之余，辛勤笔耕。他是文坛双枪将，既攻小说、散文，也热衷于理论、评论。作品曾多次在华北、河北获奖。这本《三驾马车论》，是他在理论、评论方面公开出版的第五本书。

“三驾马车”这个称谓是前几年的—次文学座谈会提出来的，《文艺报》首先予以报道。当时，评论家们在议论—个现象：现实主义复归，或者叫现实主义冲击波。两种说法，前者直白，后者含蓄，意思没有根本区别。无非是说，现实主义—度在文坛受歧视、受冷落，后来，它又有了比较强劲的发展势头，掀起新的冲击波。被归入九十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家作品，其说—不—。在我的印象里，提到比较多的有张平的《天网》、何申的《年前年后》、谈歌的《大厂》、关仁山的《大雪无乡》、刘醒龙的《分享艰难》、李佩甫的《学习微笑》等等，还有张宏森、周梅森的一些作品。

何申、谈歌、关仁山都是河北作家。何申善于写乡镇基层干部，谈歌熟悉北方的工厂，关仁山以写农村、渔村见长。如果追溯源流的话，谈歌的作品使我想起了梁斌：火辣辣，铁铮铮，—股灼人的燕赵豪气；关仁山似乎更多地接受了“荷花淀”派的影响，不乏慷慨激昂，但总是透出—分清爽与灵秀；何申的身上流

动着河北老作家的血液，也不乏赵树理式的幽默与豁达。他们的创作风格并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密切关注当前的现实生活，都潜心体验普通老百姓的酸甜苦辣，努力从建设和改革的现实生活出发，展示新矛盾，塑造新人物，倾吐人民群众的心声。他们的作品确有一定的冲击力。说产生了冲击波，并不为过。

八十年代以来，各种文艺思潮风起云涌，有活跃的一面，也有混乱的一面。文学圈子里有些同志标榜“玩文学”，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几乎把西方一百多年所创造的各种文学花样玩了一遍。后来，连“玩此不疲”的一些人也觉得玩累了、玩腻了。什么背向群众、面向自我，什么回避崇高、远离政治，什么告别革命、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是负有社会使命的，如果抛弃了社会使命，那么社会凭什么需要文学呢？文学是要为群众服务的，如果背向群众，那么群众凭什么要支持文学呢？无须过高估计错误潮流在历史上的作用，也不能无视它的消极影响。恰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种淡漠‘二为’方向、远离群众实践的倾向，那种迎合低级趣味、‘一切向钱看’的倾向，那种鄙薄革命文艺传统、推崇腐朽文艺思潮的倾向，都是错误的，应该坚决反对。”正是在文艺发展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刻，出现了一批生气勃勃、弘扬正气的现实主义力作。这不仅是现实主义的冲击波，也是人民性和时代精神的冲击波、革命文艺传统的“复归”。说“复归”，并不意味着完全恢复到过去，而是把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和时代前进的步伐结合起来。就具体作家、作品来讲，不可能每一位、每一件都十分完美。就这一冲击波的总体态势来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它不仅给人们带来一批跳动着时代脉搏、洋溢着生活芬芳的清新一作，也给整个文学界送来一股虎虎生气。

近两年来，“三驾马车”是文艺界的热门话题之一，《文艺报》、《文学评论》、《文论报》都就此展开过争论。一种文艺现象，引起议论纷纷，是好事情，说明人们在关注、在思考。有些同志特别关心“三驾马车”的艺术性，认为他们的作品在艺术上比较粗糙。论者不但为“三驾马车”感到遗憾，更为推崇“三驾马车”的人“不懂艺术”感到遗憾。我相信这些论者都有一副热心肠，希望群众影响较大的作者早日升入缪斯的艺术天国。我也认为三位作者和其他作家一样，需要在艺术上不断提高。譬如，何申如何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比较大的突破，如何把鲜活的生活开掘得更深一些？谈歌的作品如何达到更加凝炼，把思想倾向和人物形象更加自然地融合起来？事实上，三位作者都在为提高自己的创作进行努力，这是许多同行都看得到的。不过，如果说他们的创作和同辈作家比较起来，在艺术上特别逊色，这就难以令人赞同了。我认为这三位作家都有比较丰厚的生活积累、比较充裕的艺术准备，创作态度也比较严肃，鲜有浮躁之作。《大厂》在《人民文学》刚一发表，读者来信就像雪片一样飞到编辑部。这种情况是好几年没有过的。写信的多为文学圈子以外的人，是忙碌在各条战线上的普通干部群众。他们决不是为了把某部作品炒热，只是读了作品之后，深受感染，激动不已，于是按捺不住提笔写信，一吐为快。一部作品产生了那么大的感染力，靠的是什么？没有艺术性，能有那么大的感染力么！艺术性是个颇为“玄妙”的问题。如果承认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的权威评定者，那么考查一部作品是否具有艺术性，恐怕也要看看人民高兴不高兴，欢迎不欢迎，是否被吸引、被感动吧！如果只有象牙塔里的作品才有艺术性，群众热烈欢迎的作品却没有艺术性；如果群众看不懂、不爱看的作品最具艺术性，沁人肺腑的作品反倒没有艺术性，那么我们宁可选择群众而不选择那种带引号的艺术性。杨立

元同志在这本小册子中详细分析了“三驾马车”笔下的人物形象。我同意这样的意见：他们的作品是注重塑造人物形象的。三位作家的代表作，都有很鲜活的人物形象，读后令人难以忘怀。他们在艺术上追求朴素、自然，注重对生活的提炼，注重开掘生活本身的意蕴，不热衷于销售某种新观念、展示某种新技法，特别不热衷于在写作上和西方“接轨”。大约与此不无关系，西方的舆论媒体很少对他们表示青睐。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艺术品位。我以为，对他们的艺术追求应给予尊重，无须将“三驾马车”打入艺术的“另册”。

“三驾马车”和其他作家的一些作品写到生活中的某种“无奈”——有些人痛恨腐败、厌恶不正之风，出于某种原因，又不得不违心地向腐败势力作一定的妥协。如《大厂》中吕建国对郑主任的某种迎合，《分享艰难》中孔太平对洪塔山的某种迁就。对于这一点，有的同志提出很尖锐的批评，认为这是放弃文学的社会责任，引导读者对社会的负面现象认同。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确很值得思考。近几年腐败之风屡反屡刮，鉴于歪风邪气浸淫日久，生活中的确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有些人一方面痛恨不正之风，一方面又不得不走门子、拉关系，以求办成几件事。连以高扬社会主义旗帜著称的中原南街村，也要实行“外圆内方”。如果这只是一些极其个别、不具典型意义的现象，那么作家完全可以把它忽略掉。如果生活中大量存在着吕建国、孔太平那样的艰难和尴尬，那么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应当怎样面对现实？是直面人生，还是用过滤器把生活纯化？令人触目惊心的不仅在于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还在于对腐败的放纵和适应。《大厂》、《分享艰难》等作品的难能可贵，正在于没有把生活简单化，而是写出了腐败之风蔓延的新特点，写出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人物的态度不等于作者的态度。揭示吕建国、孔太平等人的

妥协迁就也不是为了让人们向腐败现象认同，恰恰是要引发人们进行更深一步的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怎样很有成效地根除腐败。当然，生活中也大量存在着李高成（张平《抉择》中的主人公）这样一尘不染、宁折不弯的人物。我们要大力塑造李高成这样铁骨铮铮的人物形象，也不能回避吕建国这样的人物。无论描写什么样的人，都要把握好度、掌握好分寸。我不敢说，谈歌等人已经把吕建国、孔太平这样的人物把握得准确无比，但他们的作品开掘出生活中深层次的新问题，无疑对读者是有启迪意义的。

今年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再过三百多个昼夜，人们就要成进二十一世纪的门坎。关于“三驾马车”问题的讨论，关于现实主义冲击波问题的议论，大概会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如何评价杨立元同志这本《三驾马车论》？这要等到更多的同志看过这本书，让它经过一段时间考验之后再说。无须我现在就来饶舌。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提供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无疑有利于推动人们对文学热点作更进一步的思考。

1999年1月于北京

作者简介

杨立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唐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唐山师专中文系副教授。先后在《文学评论》、《光明日报》、《文艺报》、《作品与争鸣》等报刊发表理论文章 200 余篇，出版长篇小说《滦州起义》、散文集《家乡戏》、理论专著《美的探求》、《美的和谐》、《美的阐释》、《文学创作与审美心理》，主编报告文学集、文学作品集、教育教学理论集 10 余部。作品先后获华北区文艺理论一等奖、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河北省文艺理论“金鹿奖”等省部级奖励 8 次。因科研成果突出，被唐山市政府等单位授予唐山市拔尖人才、唐山市首届社会科学青年专家、唐山市十佳青年作家、唐山市先进科技工作者、唐山市模范教师等称号，被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授予“1997 年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连续两届被学校选拔为学科带头人。

目 录

《“三驾马车”论》书序.....	郑伯农
------------------	-----

总 论

人文关怀与现实生活的契合.....	3
贴近现实 反映人生	20
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思索	25

何申小说论

与新的山乡共脉动	33
写出农民的真实心态	44
在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中寻求契合	49
走进何申	54

谈歌小说论

重新建构精神丰碑	63
人生的勘探者	76
时代的歌者	79

关仁山小说论

雪莲湾：一方独特的美学风景	87
生存的困顿	100
直面人生的真实图景	103
守望土地	108
荒芜的精神家园	112
豪华落尽见真淳	117
后记	123

总 论

人文关怀与现实生活的契合

——“三驾马车”论

—

“三驾马车”的出现是中国文坛 90 年代中后期的一个重要现象。他们的作品构成了文坛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

“三驾车”的出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从全国文学发展的态势来看,进入 90 年代以来,文学流派竞相亮相,文学手法翻新弄奇,但却大都远离时代、逃避现实,或在历史的积尘污垢中寻奇猎艳,或在艺术的形式和手法上玩玄弄虚。这使得整个文坛既喧嚣热闹,却又激不起读者的一点激情。文学远离了时代,文学脱离了生活,而我们的一些作家却仍在书斋里进行着文学的试验,全然不觉人民对他们的冷漠和无情。这样就使得一些文学作品成为无聊无奈的个体抒泄的工具,成为堆砌文字符号的条码。面对纷纭变幻的生活和人民大众强烈的审美需求,一些富有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们不约而同地调整自己的审美视角,稳定自己的创作心态,经过冷静的思考和省察之后,便独辟蹊径,开拓出一条既对文坛怪现象拨乱反正又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路子。这些作家们都生活在基层,对底层人民的生态和心态洞察透彻,对现实生活的矛盾焦点了如指掌,对百姓的疾苦磨难感同身受。时代的需要、人民的要求促使他们用文学这种形式渲泄情感,吐露心声。于是“三马驾车”便应运而生。应该说,他们的出现完全是

自觉、不经意的，是时代的需要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区域，但在创作意向和审美追求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没有“炒作”，没有喧闹，只是默默无闻地发表了一篇篇警醒人心的作品，就象一颗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中，在已经冷漠了文学的读者的心海中激起了轩然大波。这些作品与那些着重描写琐碎、晦涩、落后的生活现象和渲染消极、低靡、无奈的颓废情绪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直面人生、直视时弊，为人民群众代言，用小说的形式与人民大众接轨，这便迅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欢迎，也引起了其他作家的呼应。于是，现实主义文学经过一段沉寂之后，终于重新崛起，形成了一股强烈的“现实主义冲击波”。

“三驾马车”的崛起确实有着“拨乱反正”的意义。众所周知，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始终沿着现实主义的脉线前行。“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等曾引起过重大的轰动效应，那时的文学在人民的心目中是多么的神圣，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文学与人民的生活又是多么的贴近契合。进入80年代后期以后，文学便在人民中间失去了位置。一些作家硬搬照抄西方现代主义的东西，生吞活剥，食洋不化。一些作家“先锋意识”膨胀，脱离生活，疏远人民。一时间，文坛失序，作家心态失衡。固然，一些有益的探索、试验是必不可少的，但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应该是主流。“三驾马车”的出现迎合了人民的审美需要，填补了文学的审美空缺，这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从河北文学创作来看，河北文学曾写下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辉煌一页。田间、梁斌、孙犁、康濯、徐光耀等著名作家都蜚声文坛。《红旗谱》、《荷花淀》、《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小兵张嘎》等都已载入文学史册。河北文学可谓傲视群雄。然而，进入新时期以来，河北文学较之周边文学相对落伍了，由高处降至洼地，尽管出现了铁凝、贾大山、陈冲、刘章、张学梦、汤

吉夫等著名作家,但仍形不成五、六十年代那种强劲的气势。尽管河北作家在尽力做着“冲出洼地的战斗”到“平原作战”,但仍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在无奈地等待。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三驾马车”并驾齐驱,作品到处开花,以强劲的势头冲击文坛,改变着河北文学低沉的状态。他们从“山乡”、“大厂”、“雪莲湾”走来,从不同的审美区域共同勾画着中国的生存状况,透视人们心态的变化和情绪的起伏。他们的崛起,标志着河北文学走出了“洼地”,向着文学的高峰挺进。

二

邓小平同志说:“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①“三驾马车”起初都是业余作者,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他们与人民群众同处于一种同忧共难、息息相关的生活状态,没有谁比他们更了解与他们共同生活的人民群众。写出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呼声是他们共同的创作动机。他们都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文章中表现了共同的创作主张。何申曾多次表示:“作家用真心去写作,作家就要关心群众的疾苦。”^②谈歌则更为明确:“当代中国的作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作家更为艰巨,我们应该而且也必须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我们文学的表现中心。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每一个作家能够有所作为的第一个基点。”^③关仁山也表示了同样的意向:“农民问题,一直是东方社会的敏感问题,关注人类的文学理应表现他们。……文学,虽然不能够——解决农民问题,但是,文学以应有的步骤和形式,以新的形